



新华社发 潘红宇 作

“某某孩子妈妈您好,孩子要升初三了……”近段时间,不少家长频频收到这类骚扰电话。一些家长发现,来电者不仅知道自己号码,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、学校甚至年级、班级。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调查发现,从信息收集到加工转卖,再到精准营销,围绕学生个人信息潜藏一条黑灰利益链。

该图由AI生成

如何加固学生信息“安全锁”

□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杨深深

骚扰电话精准说出孩子信息

“明明没留手机号码,但电话总是频繁打过来。”北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女士说,近期接到大量培训机构的电话,拉黑一个又来一个,看到陌生号码都不敢接。

不少家长反映,骚扰信息轮番来袭、密集“轰炸”,“上班被打断、午休被吵醒、开车被打扰”,不胜其烦。

一名广州家长连续几天收到10余条类似骚扰短信,发送者使用“教信通”“京品课”“校招通”“校园邦”等不同短信签名,有的自称某某名校“退休特级教师”。

一年级小学生家长陈女士说,周末带孩子户外游乐场玩,某教培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精美贴纸、文具、气球、钥匙扣等小礼物过来,表示可以免费送礼物,但需填写孩子信息,她没多想便照做了。自此之后,便经常收到各类骚扰电话,“珠心算、编程、机器人、训练专注力,都声称可免费试课。真是贪小便宜找一堆麻烦!”陈女士说。

家长彭女士说,此前在教培机构填过个人资料,之后孩子小升初前,频繁收到各类“秘考”信息,声称可直通某名校重点班。

家长邱女士发现,有些电话一开口就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和即将升入的年级,“很吓人”。“自从孩子上小学后,基本每月都能收到这种骚扰短信。”小学生家长刘女士说。

除了干扰日常生活,个人信息泄露还可能带来诈骗勒索、身份冒用、名誉损害等风险。

办案人员指出,根据“某校某年级某班某学生”的具体信息和家长联系方式,不法分子能进一步掌握孩子日常学习和活动范围,产生多种安全风险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,有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学生和家信信息后拨打电话,冒充“学校教务处”“教育局”工作人员,以发放国家教育补贴款为名,诱骗家长转账至指定银行账户。

黑灰链条是如何形成的

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王蕾介绍,学生信息黑灰链条可分为采集、分销、滥用等环节。

在源头端,部分学生信息泄露源于掌握数据的行业内部人员。部分人员监守自盗,造成数据外泄。

广州互联网法院今年公布一起相关案例。自2021年3月起,刘某在从事学生招录中介事务期间,通过“K12教育资源交流”QQ群及互联网等途径,获取学生信息502183条,包括学生姓名、学校、班级及家长联系电话等。刘某将部分信息提供给其他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员,从中收取报酬或按招录情况获取提成。

另有部分学校、机构过度收集学生和家信信息,也是造成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。一名福建家长说,有班主任老师在家长群布置了信息收集任务,要求填写身份证号码、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,并将相关截图发到群里,带来风险。

此外,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利刻意收集学生信息。上海的一起案件显示,有不法分子长期在学校门口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,然后交由中间人,通过非法渠道查询车主姓名和手机号,最终以一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。

学生信息流入“黑市”,还会被加工和“增值”。在部分网络社交平台 and 行业交流群中,学生信息被打包成所谓“教培资源”“招生名单”,按条计价、批量出售,甚至可以按照区域、年龄、年级等条件“定制筛选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分销环节,同一批电子数据往往被低成本复制,反复转卖。

记者搜索“教培资源”等关键词发现,有中介宣称拥有全市“所有学校资源”,手中有20万条学生信息,5万条以下每条0.5元,购买5万条以上还可“买一送一”,并声称能“保证准确度”。

在成都的一起案件中,一名不法分子将1万余条中小学生的个人信息,以每条0.2元至0.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,获利4000元。

从上游信息收集者到中间倒卖者,再到部分培训机构和招生中介,最后对家长进行电话、短信和微信营销,形成环环相扣的黑灰链条。

织密信息安全“防护网”
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施行以来,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学生信息保护工作力度,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信息行为。

2026年,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,进一步深入治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,围绕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、App等过度收集信息,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

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提供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。

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,持续提升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力度。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检察院今年上半年办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中,针对某幼儿园所使用第三方缴费App存在信息泄露风险问题,联合相关职能部门,对全区相关缴费平台进行整体替换,通过身份核验精准匹配、越权查询即时阻断、页面敏感信息全程加密,以三重防护打造学生信息“安全锁”。

针对一些单位、机构内部信息管理缺位、监督制约不足问题,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研究会理事姚志伟建议,学校、培训机构、中介等掌握学生信息的主体,应进一步落实“最小必要”原则,加强数据访问、下载、复制和离职人员权限管理,对异常批量导出、查询等行为建立预警和审计机制,从源头避免信息泄露。

2026年1月,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升级上线。系统建立严格的的安全管理制度,实行账号分级授权、操作全程留痕、长期未用账号封存等机制,严格保护学生个人信息。

针对部分博主通过私信、微信等隐蔽方式进行交易的问题,王蕾建议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,对高风险交易信息和群组加强监测。对高风险领域引流账号,建立更严格的资质定期核验更新机制。社交平台应与监管部门、司法机关建立数据接口共享与动态线索移交机制,如监测到违法行为,须及时将主体信息、引流行为记录、跳转数据推送至监管部门。

持续提升治理效能,还应提高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违法成本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说,一些地方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力度,重点整治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营销招生行为,将其纳入年检和信用管理档案内容,畅通举报投诉渠道,持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。也有地方法院尝试将未成年人公益保护机制从传统的事后惩戒,升级为“彻底删除、书面承诺、预设惩罚性赔偿”三重保障机制。

姚志伟认为,要加强对非法购买学生信息的机构及人员的追责力度,进一步完善行业信用约束和重点监管机制,彻底铲除黑灰链条赖以存在的土壤。

(据新华社电)